

被摇摆于“王”“盗”之间 ——论陈胜及其起义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形象和地位

王 灿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陈胜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古代正史、官方、士大夫和主流意识形态承认合法性,甚或将陈胜视同“汤武”圣王,这与其后农民起义都被贬斥为“盗”“贼”等判然有别。即或偶有将陈胜与黄巢等并提者,也多从儆戒统治者的角度立论。陈胜的历史形象如此被摇摆于“王”与“盗”之间,却更加近似于“王”,有其深刻历史文化意蕴:他是“诛暴秦”者;刘邦集团无政治伦理思想“包袱”;《史记》、《汉书》是“正史”楷模,后世无法翻其评价,司马迁在学术史上发出高度评价陈胜的第一声,乃因前无先例,又与刘邦的肯定态度有关,亦继承了先秦民本思想遗风和汉初思想家反思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 陈胜; 农民起义; 历史评价

〔中图分类号〕 K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091-08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士大夫群体对农民起义一般持否定和贬低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尽管对此亦不乏争论,但是学界整体和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突出体现在教科书中)的态度却整体转向肯定和颂扬。然而,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却少有人注意:在对待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陈胜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历史评价问题上,却出现了罕见的交集。换言之,在对陈胜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不仅新中国的学术界、主流意识形态是颂扬,古代的态度也不像对待其他农民起义那样否定,而是予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同时,由于它同时兼有中国古代大规模农民起义“首例”的身份,并处在在中国历史上重要转型期,其评价问题还与《史记》和《汉书》这两部中国史学史、文化史巨著紧

密相关。这诸种因素的交织,造成了这一在中国古代史中饶有特色、极富历史意蕴的现象,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伦理思想的演变特色,也折射出中国历史观念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应该认真审视和探讨。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照一般说法,自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发其端后,几乎代代有之。对于这些农民起义,在中国历代正史或官方的评价中,一般均视之为“犯上作乱”的、大逆不道的反叛行为,必须予以严厉贬斥,使之无“容身之地”。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

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作为中国大规模农民起义首例的陈胜吴广起义,尽管领导者陈、

〔收稿日期〕 2013-10-14

〔作者简介〕 王 灿(1972-),男,山东枣庄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在站文学博士后,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论研究”(项目编号:12RWZD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隋唐史论研究”(项目编号:13YJAZH031)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学术研究成果之一。

吴二人均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其身后际遇与后世的农民起义后继者迥异，在陈胜身故后不久建立起来的汉朝初期，陈胜曾被称为“陈王”，汉高祖刘邦还专门拨付祭田，派专人守护管理。^[1]（P. 1962）作为中国正史之祖的《史记》，将之列于只有诸侯、将相或者后世王侯才有资格进入的“世家”，而且紧紧排在“万世师表”的孔子之后。在体例上进一步奠定后世“正史”楷式的《汉书》，虽然表面上将陈胜从“世家”变为“列传”，但需要注意的是，《汉书》在整体上取消了“世家”，而不是出于贬低陈胜的目的。事实上，班固将陈胜和项羽二人合为一传，并且将此传放在“列传”的第一位，排在汉朝各诸侯王之前，甚至远远排在汉朝开国元勋萧何之前，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陈胜的“首义”之功。而且，一般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陈胜吴广起义，在汉朝以后的古代正史和官方评价中亦未与后世的农民起义等同而被完全否定和严词斥责，^①甚至有官方正史公然在选文中将之与中国道统行列中的“圣王”相提并论——在《宋史·第二百二·文苑五·苏洵传》中，史臣因为苏洵“文多不可悉录，录其《心术》、《远虑》二篇”全文，而《远虑》篇中苏洵言“司马氏，魏之贼也，有贾充之徒为腹心之臣以济，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则？无腹心之臣，无机也，有机而泄也。”^[2]（P. 13096）虽然这并非《宋史》史臣自言，但是，在众多的苏洵文章中独选此二篇，必然是以其为苏氏之代表作，如果此篇所论大触官方忌讳，或有违传统伦常，则史臣绝不会如此选择。由此可以窥探出苏洵所论之陈胜吴广形象及其作用，必为当时史臣乃至整个知识界的共识，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此文作者苏洵所处时代的认识。因为，《宋史》言“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文多不可悉录，录其《心术》、《远虑》二篇。……宰相韩琦见其书，善之，奏于朝。”^[2]（P. 13093-13097）当然，在有些文人和若干历史篇什中，陈胜也会被与黄巢等人相提并论，然而却多是基于儆戒统治者爱惜民力、施行仁政的角度立论，并无明显的、特

别抨击陈胜的意味在内。^[2]（P. 12803）总之，陈胜及其起义在中国古代的地位相当正面，其他农民起义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造成这种情况的背后原因究竟为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建国以来，学术界关于农民起义的论文论著非常多，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号称是“五朵金花”之一的历史界“显学”。在建国后普遍为农民起义“平反”的情形下，我们很自然地将陈胜吴广起义和后世的其他所有的农民反抗行为一样“正名”为“农民起义”，却少有人注意到陈胜吴广起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地位相当高，与其他农民起义迥异。

当然，仍有学者在某些侧面和程度上触及这个问题。比如，有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对陈胜吴广起义的评价与后世古代官方对历代农民起义有异，但是没能进一步注意到，后世官方对陈胜吴广起义的评价同样不同，而且在此不慎颠倒了历史顺序，说司马迁为“农民起义者正名”。^[3]也有学者敏锐地发现了汉朝人对陈胜态度有所转变。^[4]然而，却没能进一步看到，虽然陈胜在汉朝的地位有所变化，但是这种较低评价仍然不能代表官方，只是个别学者的看法。更重要的是，陈胜在后世两千年间的封建时代，其所受评价并没有被明显贬低。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陈胜之所以在西汉初年被称为“王”，并且由专人负责祭祀事宜，是因为他为刘、项继而起事并最终建立汉朝政权“导夫先路”，^[5]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其实，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此亦有明确解释“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至今血食。”^[1]（P. 1962）但是问题似乎还不仅仅于此——如果以此推论，何以其他同样为封建王朝导夫先路的农民起义领袖（如西汉末年赤眉军领袖和元末红巾军领袖刘福通、韩山童等）却不能像陈胜一样享此地位？

历史上农民起义首领为后来封建正统朝廷先导其路者尚有不少例子，比如，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军起义，是东汉政权直接先导；隋末农民大起义，也曾为后来唐朝政权的建立扫清道

① 笔者曾就“二十四史”中涉及陈胜评价的地方做过统计，没有发现有像严词斥责其他农民起义者那样贬斥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形。

路；后梁太祖朱温，以黄巢部将的角色降唐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从参加“红巾军”起步而最终建立了明朝。但是，这些曾经为后来正统王朝奠基的农民起义及其领导人，却都没有享受到陈胜那样的历史地位，而是被贬斥为“贼”“盗”，有的根本没有资格被列入专传，而是被附入其他的传记或者篇章中（如赤眉军起义和绿林起义基本上被《汉书》附入《王莽传》中，或被《后汉书》附入《光武帝纪》、《刘盆子传》等篇章中；元末的刘福通和韩山童也是同样被《元史》附入他人传记）；有的被作为反面典型附于各正史的“列传”之末（如黄巢就是被列在《旧唐书》的最后并大加挞伐，称之为“贼”，^[6]《新唐书》亦同）。凡此种种，史籍皆可证。

可见，“导夫先路”不能成为陈胜不被贬斥的充分理由，而且，陈胜仅仅是为西汉“导夫先路”，何以后世皆亦心甘情愿随刘邦起舞？而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这其中的反差有什么历史文化意蕴？——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二、“暴秦”恶名与“智囊”影响

诚如上述，陈胜吴广起义确实起到了为汉高祖建立汉朝“导夫先路”的作用，同时，汉高祖刘邦本人也与陈胜一样起于微细，这确是陈胜没被汉初视为“盗贼”的重要原因，但是，陈胜声名定评与汉高祖及刘汉朝廷之间的微妙关系或还不止于此，对此还应该有更深层的思考。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应该首先注意陈胜吴广起义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刘邦核心集团的特质问题。

就特殊时代背景而言，陈胜吴广起义反抗的对象，是曾经灭亡六国、统一中国、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理念、但又很快“二世而亡”的秦朝，这在历史上格外引人注目。也就是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身份”非常特殊的朝代——它是中国历史上因为残暴统治而快速由强转而覆灭的典型——“暴秦”！并且“暴秦”还是此类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大的反面“典型”！

可以说，正是因为“秦”的残暴声名，使得“民本”意识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对推翻这个残暴政权的反抗行为赋予了“合法性”。

典型旁证可列出两条：其一，是“汉初三杰”之一、作为刘邦首席智囊的张良。他曾经找力士于博浪沙谋刺秦王而未成功。按照后世的所谓正统封建伦理道德，张良行为实属大逆不道。然而，同样可讶的是，张良在中国古代史上一直被当作一个非常正面的典型——正义（为韩国复仇）、勇敢、睿智，是世所仰望的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形象，两千年来根本无人从伦理道德上对之质疑。苏轼的《留侯论》就是称颂张良大智大勇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可以代表整个古代的一般看法。其二，是作为秦末抗秦战争另一主角的项羽。项羽尽管也曾叱咤风云但毕竟下场很惨，而且他既曾暴力覆秦，又曾对抗初建的汉朝，按封建伦理来说，他这样的人物几乎是一无是处的。然而，同样让人费解的是，尽管也有不少文人或者史书从性格、成败等角度批评项羽，但是整个中国古代却罕有人抨击项羽暴力叛秦的“大逆不道”行为。或许，我们可用“刘邦也曾经同样抗秦所以无法否定陈胜、项羽”来解释上述现象，然而，刘邦毕竟是汉朝的创建者，按照历史上一概“成王败寇”的逻辑，由于他有“成王”的护身符（就像后世其他开国帝王一样），他不受封建伦理道德的谴责可算理所当然，然而张良、项羽（以及其他的秦汉之际农民起义领导者）却不同于刘邦，尤其是项羽，是刘邦的死敌——为何也不受谴责呢？

其实，张良、项羽之所以不被谴责，同样是因为他们反抗的对象是“暴秦”！因而，从堪称中国古代最高的伦理道德（“民本”思想）来说，对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无道王朝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秦朝（尽管后世也因秦朝的强大和统一而赞颂它，但是，一则这种声音远不及对其暴政的谴责来得强大，二则二者观察的角度有别）而言，反抗其暴政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是非常正义的。舍此理由之外，无法解释上述现象。

那么，问题还会出现：其他农民起义所反抗的王朝，其末期哪一个不统治腐朽或者残暴呢？是的，尽管其他王朝都在某种程度上称得上腐朽或者残暴，但是，由于所处历史阶段的差异，都没有像秦朝那样，和前朝的周代及之后的汉代（这两个朝代都以长治久安著称）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秦朝正好处于一个以“仁义”为治国理念的、国祚最永的周代之后，而且在得国

手段、治国理念、国祚长短等各个方面都可以作为正反两面的例子形成强烈反差。同时，也由于秦朝之前的强大和其迅速覆灭之间反差极为明显，所以，只有秦朝才被视为残暴统治和快速覆灭的典型。因而，陈胜起义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时的人民颂之为“伐无道，诛暴秦”，^{[1] (P. 1952)}“暴秦”一词既出，即成习语，为秦朝统治“定性”，“秦政”遂成“暴政”之典型代表，成为一个朝代最应该被推翻的“名头”。^[7]

刘邦之所以肯定并派专人负责祭祀陈胜，还与其自身及身边核心幕僚的身份有关。

在此，我们不妨将刘邦和朱元璋做一下对比。刘邦和朱元璋在出身、创业等很多方面都极为相似，但是唯独对待其赖以发迹的农民起义军态度大异。前述刘邦“为胜置守冢于砀”，用具体行动为陈胜的身份奠定了正面评价的、第一块具有“正当性”的基石。而朱元璋的做法截然两途：在其致蒙元统治者书信中，他将曾经参加并赖以起家的红巾军视为“妖”，^{[8] (P. 926-907)}明太祖时期宋濂承旨所修的《元史》也一脉相承，不仅称红巾军为“妖”，而且明确将刘福通、韩山童的起义行为称之为“反”“乱”。^[9]刘邦与陈胜，朱元璋与刘福通、韩林儿，同样都是出身微细，后者均为前者先导，且元朝暴兴暴亡与秦亦有相似之处，然而，何以刘、朱二人和汉、明两朝，对其建国“先导”的态度如此大异呢？

究其个中缘由，当然不是刘邦与朱元璋的人性不同，而是与他们在征战建国过程中身边谋士的身份及其所受的影响密切相关。朱元璋身边的股肱谋臣，如宋濂、刘基、朱升等人，皆为所谓“儒生”身份，而这些“儒生”，他们所受的教育实际上杂入了法家君主专制主义的、儒法合一的思想内容，因而他们的君臣伦理思想非常浓厚。不仅如此，一些儒生曾在元朝任职，刘基曾中元朝进士，宋濂也曾被荐举。尤其是作为朱元璋首席文臣的、曾草拟多份著名檄文的宋濂，专重《春秋》，^{[10] (P. 3777-3788)}而《春秋》特重君臣“大义”。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在其征战过程中一直主动接纳儒生（如宋、刘、朱三人皆其访求所得），或追封先祖，或祭祀孔子，恒言虽元朝气数已尽，但是“元祖宗功德在人”，^{[10] (P. 19-20)}力争“正统”和“道统”的意味极为浓厚，甚至为此有不惜替元朝统治者开脱之

言。《明太祖实录》载“癸酉，中书省以左副将军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谕天下。上览之，见其有侈大之词，深责宰相曰‘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何乃习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体，妄加诋诮！况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而以此张之，四方有识之士，口虽不言，其心未必以为是也。可即改之！’”^{[8] (P. 1040-1041)}当然，朱元璋对于元末红巾军所赖以发难的白莲教极为不满，也是导致他最终选择站在了红巾军对立面的重要原因。而且，洪武时期，甚至包括整个有明一代，元朝或其残余势力仍相当强大，朱元璋发布檄文或者致信于蒙元统治者，带有劝降和笼络之意，希望对方能够认清形势，天命已经转移，不要再顽抗。而出于自居为“天命攸归”的新“天子”立场，同时也是为了争取蒙元统治者，他自然就要抨击已经处于穷途末路的红巾军为“妖”了。至于明朝统治稳固后，无论是刚愎自用的朱元璋自己或其子孙，都不会再否定他自己已经做出的结论，很难再为红巾军“平反”。明成祖“靖难之役”中，方孝孺的极端忠君行为，可作为明朝奉行所谓“君臣大义”理念的典型代表。而方孝孺生命早期与明太祖时代晚期正好重合，恰好可作为明太祖重视君臣伦理教育的有力证据。

再看刘邦。刘邦征战时身边的重要谋臣无过于萧何、张良，但是萧何仅为秦朝小吏而已，不闻其精通典籍，亦谈不上对秦朝有感恩戴德之念，且其长处不在侈言伦理纲常，而是擅长于后勤事务及财政、户籍之事。至于张良，亦非儒生，而颇有侠士之气，与秦朝本有大仇，曾有“博浪击秦”的壮举传世，自然更不会将率先举起义旗的陈胜视为仇敌，反而会引为同调。刘邦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对儒生多有蔑视侮辱言行，且多有粗鲁之举，可以作为其身边智囊及整个统治集团不重视伦理纲常的旁证。

总之，股肱谋臣对古代君主的熏染绝对不可小觑，尤其是对开邦建国的雄才大略之君而言更是如此，因其极富天赋。孟子曾云“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11] (P. 5899)}孟子在此强调君主身边之人对君主的影响，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刘邦和朱元

璋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受到了其身边智囊和近臣的极大影响，才有了迥异的道德和价值取向。当然，至于后来刘邦又听取公孙弘等儒生的意见并且重视儒学、讲求君臣大义，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三、正史垂范与评价摇摆

除了陈胜吴广起义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刘邦核心集团的特质问题这两大客观因素，陈胜及其起义在后世得以基本上“逍遥于”封建伦理纲常之外，其原因还与学术上的示范作用有关。以《史记》为嚆矢、《汉书》继其后的两部“正史”“冠冕”，对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领导者的态度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和“消毒”的作用，使得后世的正统史家很难完全否定。

前已述及，正是基于反抗“暴秦”的正义性和刘邦的肯定行为，司马迁才在《史记》中对秦末农民起义抗秦行为予以褒扬。而随着后世将《史记》列为“正史”第一部，从体例等各个方面予以模仿，其对于陈胜及其起义的态度也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正当性，后人很难加以推翻。东汉班固又在《史记》基础上修《汉书》，在体例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化，陈胜及其起义的评价问题，班固几乎完全沿袭司马迁，而且后来《汉书》同样被奉为官方“正史”楷模而受到学者尊崇，这就更加强了司马迁已有评论的权威性。因此，尽管《史记》《汉书》后来也曾受到一些史家和学者的非议，但是，二书的成就和影响极为巨大，很难抹杀和消除。“《史记》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书》完善定型，为不祧之祖。”^[12]同时，它们的成就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内在真理性的反映，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史记》所奠定的、《汉书》所沿袭并强化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一直维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后世史家和学者无法从根本上推翻。另一方面，作为杰出史著的两大“正史”，其地位为官方所肯定并宣传，同样也反作用于后世的所有封建统治者，使得他们同样都深以“暴秦”“亡秦”为戒，受制于这种根源于“民本”意识的思想，使得他们也戴上了“紧箍咒”。

然而，农民起义对统治者而言，是不可容忍、更不能褒扬的敌对行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

统治，要本能地贬低它，并置之于伦理上的万劫不复之地，这就使得对陈胜及其起义的评价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否定之，则汉高祖作为正统帝王和马、班作为正史巨擘的权威何存？如果承认之，则无异于鼓励后世起而效法之。——这是多么严酷的伦理上的“折磨”！

但无论如何，总要找到一种看似“两全”、实则为调和的解决办法。于是，后世官方、正史作者及一般文人，只好摇摆于这“王”与“盗”之间：一方面，由于后世的封建“正统”、君臣“大义”观念愈来愈严，他们在评判后世其他的农民起义时，必然要遵从严格的政治伦理规范和统治者的意旨，不敢有所违背，从而一概斥之为“盗”“贼”“寇”；另一方面，一旦他们涉及被《史记》和《汉书》所肯定的陈胜及其领导的起义时，又必须承认《史记》《汉书》的真理性和权威性，承认起义是反抗“暴秦”的正义之举。很显然，后世史臣和士大夫由于无法调和其中的矛盾而变得左右依违、进退失据：一方面是被有正统地位的汉高祖所承认的客观事实，以及同样为历代官方承认的两大“正史”之祖的不刊之论；另一方面是后世愈显严格的道德伦理之网和现实政治的压迫。夹于二者之间的史家和文人们，就只有首施两端，采取两方面都承认的策略：既承认《史记》《汉书》的已有评论，又“下不为例”，对后世的其他农民起义，一概采取严词抨击、完全否定的态度。

为了实现这种解释的圆满性，他们就必须从其他方面去寻找答案，而在历史上，陈胜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反抗目标，恰恰是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理念、快速覆亡的“暴秦”，因此，“暴秦”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可以用来开脱自身矛盾性的、最好的“箭靶”和“消毒剂”。这恰恰又更加证明了我们上文的观点。

四、先秦遗风与前无先例

前已述及，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而言，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将陈胜列入《世家》并肯定其历史功绩，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化史上都给了后世史家、士大夫、文人们以深刻的影响。所以，作为肯定陈胜历史功绩的正史作者第一人，司马迁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不过，还是有些问题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偏偏是司马迁在第一部正史《史记》（而非后世其他著作）中，表露出诸如肯定陈胜吴广起义在内的如此多的异端思想？要想进一步了解清楚其中原因，还必须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社会特征探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历史的反思、对暴秦的抨击、对陈胜及其起义的正当性的认识，这些并非是司马迁的首创，而是他继承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以及汉初诸位思想家的反思成果。汉初以贾谊和陆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在他们的著作《过秦论》《新语》等书中，都对“暴秦”暴兴暴亡的原因和秦末农民起义有深刻的认识，他们都严厉抨击了秦朝的不恤民力、统治残暴，认为陈胜揭竿而起是一种正义行为。而这种认识是与他们对于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专制统治——的认识相呼应的。那么，为什么汉初的知识分子甚至到司马迁时，他们能有这样的认识呢？这就要拜先秦时期遗留下的“民本”之风，以及君主专制制度产生初期较为宽松的政治伦理氛围之赐。司马迁、贾谊和陆贾等人，所处的西汉初期及其家世、家教等方面，都还存有先秦的遗风。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中，臣子的地位和尊严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持。比如，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3]强调君臣之间都要互相尽义务，甚至把君主要首先有君道置于前，而不是仅仅强调君尊臣卑。孟子则更是强调：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11] (P. 5928 - 5929)}

而且，孔子孟子所言并非是一种理想，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从孔孟一贯主张“复古之道”

来看，这些正是他们之前时代的做法。当时，中国的“民本”观念仍然远超过后世被法家所鼓吹并逐渐强大的“皇权至上”观念。“皇权至上”的思想在秦朝时期，由于被秦朝将法家思想当作国策而达到极点，所谓“法家君主专制理论促进了秦王朝的兴盛。通过秦孝公、商鞅和秦始皇、韩非等人物论证了法家君主专制理论促进了秦王朝的兴盛”，同样，“法家君主专制理论加速秦朝的衰亡。”^[14]“暴秦”的昙花一现，使得中国以后的各朝代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但是又不愿意真正实行儒家的那一套，而是实行了“霸王道杂用之”的阳儒阴法统治策略——“在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法合流成为主导趋势，儒法合流的‘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则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15]儒家思想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缓冲阀”、陪衬或者一种治国的理想而被高高悬起，却又并不切实付诸实施，真正实施的倒是他们口头上予以反对的“秦制”。这种历史的吊诡，张金光先生曾论述过“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即由之开辟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新纪元，其后其前的历代王（皇）朝皆无可与之比拟者，二千年来的帝国制度正反两方面都可以从秦找到它的历史缩影，都可以从秦的制度中找到它的根基和因子。”^[16]张先生一言道出了“秦制”对于后世帝国制度的巨大影响及后世帝国制度的实质。

曾有学者指出，中国“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到辛亥革命爆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我国存在了 2100 多年。君臣关系的变化很形象地说明了专制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加强”。^[17]其实，不仅是秦朝以后君臣关系日趋君尊臣卑，如果上溯到先秦时期（虽然不是君主专制政体），同样也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比起秦汉也更加宽松而尊重臣子尊严。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皇权仍有相当程度的质疑空间，臣子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后世那样高下悬隔，而是有相当大的个人尊严存在。流风所及，“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等大臣待之以礼。大臣谒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大臣座。大臣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去探视”。^[17]太史公司马迁自己在《报任安书》中曾泣血自述其心境，恰好可以曲折反映出他对当时汉武帝摧折士大夫人格的不满：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能与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诟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18]

这段话表面为自贬之词，实则隐含了对汉朝统治者滥用君威的谴责。作为饱读史书典籍、堪称当时最博学的太史公，他是必然熟知历史典章制度的，对先秦时期君臣相处之道中的臣子地位有清晰的了解，所以才会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从而有此愤激之词！

其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尤其是作为两个崛起于陇亩之间的平民率领的起义军竟然带头来反抗看似强大无比的“暴秦”，这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且在此前的历史评价中也无前例可以援用。于是，如何评价这个事件，就无法依靠以往的“经典”或者“圣人”，就只有自己开动理性去反思：为什么战国诸雄一个个先后灭亡于“强秦”之下，而揭竿起义、手无寸铁的农民，竟然能够成为这个强大帝国的掘墓人？思考的主体，既包括陆贾、贾谊，当然也包括司马迁，同时也包括西汉初期的统治集团。^①而且，在司马迁时代，封建政治伦理的束缚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僵化至极而以“教条”来强行

“笼罩”或者改变事实，甚至还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汉高祖刘邦）的肯定，可以之作为“尚方宝剑”，所以，他们对于陈胜吴广及其起义的评价，就可以更接近于理性。总之，先秦的遗风和汉初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司马迁对陈胜及其起义的评价获得了更多的思想支持。

当然，随着中国封建道德伦理（包括政治伦理）观念的逐步确立，^②特别是后儒对于正统、政统、道统等等的争论，^③强调正宗、正统、反对犯上的封建政治伦理观念逐渐增强，后世的农民起义再也不可能逃脱这张无形的“大网”。于是，对陈胜及其起义的特殊评价，就成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

五、结语

总之，在中国古代，陈胜及其所领导起义的历史形象及其评价，被“正史”史家及士大夫们摇摆于“王”与“盗”之间，而且前者的形象更为彰明，远胜于后者。这种历史地位迥异于后世其他农民起义及其领袖，可谓天地悬隔。这主要是由于陈胜起事理由正当，即“诛暴秦”；同时，刘邦及其核心幕僚们，由于身份等方面的原因，没有政治伦理思想方面的“包袱”，因而很自然地引之为“同调”，视之为建国的“先导”加以祭祀；而《史记》、《汉书》作为“正史”楷模，它们对于陈胜的评价，后世亦只有予以承认和尊重；同时，司马迁之所以敢于在学术史上发出高度评价陈胜的“第一声”呐喊，既因其前无先例可循以评价，又与刘邦作为最高统治者已有的“定性”有关；当然，司马迁也继承了先秦“民本”思想遗风和汉初思想家反思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元〕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3〕王继龙. 英雄豪气撼乾坤——《陈涉世家》为农民起义者正名的佳作〔J〕. 语文教学之友. 2010（9）：29—30.

① 比如，“萧规曹随”的“无为之治”其实就是反思“秦政”的结果；后来的“文景之治”也不过是循此路线做下去而已。

② 这其中并不完全是儒家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发源于荀子、大张于韩非的尊君思想更是占了主流地位，具体内容请参见：方尔加先生《荀子新论》，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由于篇幅关系，此不多赘。

③ 请参见饶宗颐先生《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4) 周乾滢. 汉人对陈胜农民起义态度的转变 [J]. 史学集刊. 1991 (4): 封二.
- (5) 晁福林. 司马迁与《陈涉世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1 (3): 50-52.
- (6) [后晋] 刘昫.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99-730.
- (7) 王绍东. 论“亡秦之鉴”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A]. 雷依群, 徐卫民, 秦汉研究 [C].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45-152.
- (8) [明] 夏元吉等. 明太祖实录 (卷四十六) [M]. 史语所本.
- (9) [明] 宋濂等. 元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891.
- (10) [清] 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 (清嘉庆刊本)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2) 傅正义.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J]. 渝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1): 32-39.
- (13)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 (清嘉庆刊本)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360.
- (14) 王雷. 法家君主专制理论与秦朝的兴衰 [D].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 摘要.
- (15) 孟祥才. 试论西汉“霸王道杂之”统治思想的形成 [J]. 山东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78 (2): 16-20.
- (16) 张金光. 秦制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自序第11页.
- (17) 徒跃林. 坐着站着跪着——浅析中国古代君臣关系的发展 [J]. 历史学习. 2007 (11).
- (18) 张大可. 史记全本新注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0: 2194.

Swaying between King and Bandit ——On the Special Image and Status of Chen Sheng and His Uprising in Ancient China

WANG Can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uprising led by Chen Sheng was the first large-scaled peasant uprising in China's history. To a large extent, its legitimacy was recognized by official books of history, officials, scholar-bureaucrats and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ancient China, and Chen Sheng was even regarded as a sacred king like Emperor Shang Tang and Emperor Zhou Wu. This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later peasant uprisings which were denounced as bandits and thieves. Even if occasionally some people drew parallels between Chen Sheng and Huang Chao, their aim was to warn the rulers to take care of the people. Between king and bandit, Chen Sheng was more like the king. This special image and status of Chen Sheng and the uprising led by him are of profound historical culture implication: Chen Sheng's revolt was aimed at overthrowing the cruel Qin Dynasty, while Liu Bang's ruling clique did not need to consider political ethics. Sinc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y Sima Qian and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Ban Gu were models for official history books in ancient China, no scholars and rulers in later generations were unable to repudiate their appraisals. Sima Qian was the first scholar who highly appraised Chen Sheng. His unprecedented appraisal was related with Liu Bang's affirmative attitude. It also shows that Sima Qian inherited both the people-first ideology of the Pre-Qin period and introspection of thinkers of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Chen Sheng; peasant uprising; historical evaluation

(责任编辑 李 劼)